

研究生和教师中，极大部份都是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这正好和我们的情况相反，平时各校心理学师生之间的来往交流也很多。研究生和教师都可以到其他学校去学习、工作一段时间。上学季，我所在的伯克莱心理学系，就有好几个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夏威夷大学的美国访问学生、访问学者。教授们在几年一度的休假期间，除了写书外，往往到其他大学（包括国内外）去讲课或做研究。至于平时的互相访问，请他校的教授来做学术报告等更是很平常的事。伯克莱和斯丹福比较近，所以两校心理学系的关系更为密切。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可以互选对方的课。我刚来此地时，就有一个讨论班，等于是两校合办的，一周在伯克莱举行，一周在斯丹福。上学季我又到斯丹福去旁听了一个讨论班的课。两校的图书馆也有协作关系，师生们可以互借对方的书，每天还有免费校车来往，连我这个访问学者也可以享受这个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每一个学校都可能有自己的长处特点，但也可能有它的不足之处。他们这样做，可以便大家开阔眼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由于拘泥于一个小学校的小天地里而形成的眼光狭窄、思想僵化。

以上所谈的，许多不仅仅是心理学的问题，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和方法，但对我们心理学工作也同样有参考价值，不知你们意见如何。

我将如期于明年一二月间回国，那时再向同志们详细汇报我在国外的体会和感受，同时也希望能听到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好消息。

致

敬礼

作者1981年9月6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莱

美国心理学家D.N.鲁宾逊

给心理研究所一位研究生的信

最近，美国鲁宾逊*教授在给我们的一封来信中，谈到他对研究心理学的理论和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将信中有关内容摘译如下，供大家参考：

我写这封信，因为我想讲明，我认为心理学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对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是重要的。中国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心理学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出现过的混乱和争吵。然而，假如想要避免错误和杂乱无章，根本的一点在于年轻一代的心理学者们要充分地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的和思想的基础，而不是仅仅了解它的（实在太多的）事实和（确实过于方便的）方法。

直到最近，苏联心理学仍然几乎完整地维持和巴甫洛夫心理学的一致性，后者从一开始就有致命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也是为人所熟知的。由于过去几十年苏联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所以现代中国心理学不可避免地同样受到巴甫洛夫学派的连累。

在美国，尽管学术研究不受这种或那种“官方的”党派路线的约束，但是我们却也受到了若干有缺陷的体系的某种牵制，这种体系是行为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激进的）神经心

理学。美国的有害于清楚地进行思维的障碍已不是政治思想意识，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时尚”形式（a form of intellectual “fashion”）。在急切地试图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科学心理学的时候，西方的学者们都表现出过分的热心，以至于忽视了一些人类的心理特征，但正是这些特征引起了需要科学心理学认真注意的严肃问题。关于这一点，我需要提及的仅仅是语言、美学和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现在有清楚的迹象表明，美国以及欧洲和英国的较优秀的心理学家们正想要重新思考心理学问题的总体性质，甚至于想要估计我们的最可靠的方法和研究结果也许在实际上并不中肯的可能性。我并不是把这种重新觉醒描绘成一次运动，但我确实认为这种情形将会增长和发展，并且二十一世纪的心理学将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同时，正象所有的学术和科学的形态那样，那时的心理学也将是从它自己的历史根基之上成长起来的。因此，现时的这种迹象只是它的开端，而在上述两个方面每一个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

*鲁宾逊（Daniel N. Robinson, 1937），美国乔治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学理论和历史、社会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

1. 《现代心理学体系》，1979年。
2. 《心理学思想史》，1976年。
3. 《心理学和法律》，1980年。
4. 《心理学：传统和展望》，1976年。
5. 编辑《遗传和成就》，1970年。
6. 编辑《对心理学历史的重要贡献》，共28卷，1977—1978年。
7. “关于脑信息过程的神经电活动”，载于《心理生理学》杂志，1975年，No. 3，26—28。
8. “治疗：现时的一种清楚的危险”，1973年，No. 28，129—133。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研究生乐国安）

一九八一年九月